

罗易赴华使命

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

〔美〕 罗伯特·诺思 编著
津尼亚·尤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027 1178 9

罗 易 赴 华 使 命

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

〔美〕罗伯特·诺思 津尼亚·尤丁 编著

王 洪 杨云若 朱菊卿 合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obert C. North and Xenia J. Eudin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3

罗 易 赴 华 使 命

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

(美)罗伯特·诺思 津尼亚·尤丁 编著
王 淇 杨云若 朱菊卿 合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1.875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307,000 册数：10,500
统一书号：11011·95 定价：1.10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罗易赴华使命》，是由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罗伯特·诺思（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和津尼亚·尤丁（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著的，基本上是一本资料性质的书，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1927年上半年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工作期间所写的文章和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另一部分是编著者根据上述文献资料、结合中国革命的情况所写的历史评论。

本书编著者认为共产国际支持国共合作又支持工农运动（即所谓“自上革命”与“自下革命”的两种策略）是绝对矛盾的，“两者是对抗性的、互相排斥的政策”，从而构成了共产国际立场的根本“弱点”。他们在评论中一再渲染这个所谓“弱点”，着力描写苏共和中共领导人如何“发生内部冲突”，革命如何走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灾难”，等等。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是直接违反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理的（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275、334页）。当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如何领导农民运动，如何处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当资产阶级右翼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叛变革命以后，党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所执行的政策得失如何？这是值得总结和探讨的。

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罗易所汇编的文件部分，特别是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及其前后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所作的几次讲话，为研究当时革命发展情况和党内意见分歧，提供了许多原始材料。

罗易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1887年2月22日〔一〕，罗易出生于加尔各答附近一个村庄的婆罗门家庭，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年青时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激进民族主义者。1916年，他为搜集进行武装斗争所需要的武器去到美国，这时开始使用罗易（M. N. Roy）的化名。1917年6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逮捕进行亲德反英宣传的印度民族主义革命者；这年7月，罗易逃往墨西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罗易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9年春，罗易在墨西哥遇见了鲍罗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年10月，罗易协助建立了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他代表墨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在讨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罗易提出了一些意见，列宁要罗易写一个补充提纲，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和由罗易起草、经列宁和委员会修改的《补充提纲》。罗易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二次大会结束时，共产国际在塔什干设立了中亚细亚局，罗易是负责人之一。1920年8月，他到塔什干；10月，在塔什干成立包括罗易在内的第一个印度共产党（沙菲克为书记）。此后，他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三、第四、第五次大会，担任过许多重要工作。1926年11—12月，他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并参加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参加第七次全会的中共代表为谭平山。会后，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和谭平山同来中国，他们于1927年2月到达广州，4月初到达武汉。罗易参加了4月底至5月初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对会议的进展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1927年7月15日，汪精

〔一〕这个日期是根据罗易的父亲所保存的日记确定的。但是，印度政府保存的某些记录说是1888年。还有一些人（包括罗易的妻子）认为是1893年，这个说法与罗易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述是吻合的（见卡尼克著《罗易政治传记》，1978年，孟买，英文版）。

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同年7月底8月初，罗易离开中国到莫斯科。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罗易（他因病未出席第六次大会）对第六次大会的一系列决议持反对态度，并同德国共产党的布兰德勒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攻击共产国际的文章。1929年12月13日，共产国际将罗易开除。此后，罗易逐渐走上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1930年12月，罗易秘密回到印度从事民族运动。1931年7月21日在孟买被捕，经过五年多的严格监禁，于1936年11月被释放。出狱以后，罗易加入了印度国大党，并参加竞选国大党主席的活动。1939年3月，他又建立了激进国大党人联盟。1939年9月，英、法对德战争爆发，罗易同一般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立场相反，坚决拥护反法西斯战争，跟国大党发生严重意见分歧。1940年10月，罗易被国大党开除，同年12月，罗易另组“激进民主党”，积极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易揭起“新人道主义”（或称“激进人道主义”）的旗帜，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声称政党是民主的障碍，“新人道主义”同政党的观念不能相容，因而在1948年12月宣布解散“激进民主党”。1954年1月，他在台拉登寓所病死。

在二十年代，罗易曾经是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他被派到中国来工作，是他具有一定声望的表现。他在中国工作期间，同鲍罗廷和陈独秀常有意见分歧，有时吵得不可开交，也与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罗易毕竟是缺乏实际经验而水平有限的。1936年毛泽东同志对斯诺介绍党的历史时，对罗易有所评论。他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这个评论是恰当的。例如，罗易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主张发展农民运动，深入土地革命，但是，在如何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他也拿不出具体办法，最后实际上放弃了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上，他保护陈独秀过关，并夸大了第五次大会的作用。在处理同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上，他也不比别人高明多少，甚至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如他擅自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电报副本交给汪精卫看，给汪精卫提供了“分共”的借口，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927年上半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的重要时刻，罗易提供的历史文件（包括罗易的注释和按语），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问题（例如，发展工农运动和联合资产阶级的 问题，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可能性问题，对第五次大会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问题，等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我们将《罗易赴华使命》一书翻译出版，供党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本书所附文件，约有三分之一曾在当时报刊上发表，由于已经作为历史文件流传，原则上不再重译，对少数不确切的旧译文，加了注释。在本书的前六章中，大量引用了蔡和森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此文载1929年苏联出版的《中国问题》杂志第一期（俄文版）。由于尚未见到该文的中译本，而《顺直通讯》上所载《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在内容文字上似亦与《中国问题》杂志所载有出入，我们决定按照本书英译文翻译，以存一说。特此说明。

本书《书目索引》是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光域同志翻译的；清华大学刘桂生同志提供了第二十九篇文件的译文初稿，均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王 洪 杨云若 朱菊卿

1980年5月

目 录

序 言	文件的来源及其意义	(1)
第一章	列宁、罗易和国共联合	(12)
第二章	第七次全会和土地问题	(32)
第三章	左派和右派的分裂	(47)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69)
第五章	农民的挑战	(88)
第六章	失败	(115)

文 件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中国问题决议案 (1926 年 11 月)	(135)
二、中国革命的意义 (1927 年 2 月 22 日)	(150)
三、一个警告 (1927 年 2 月 27 日)	(154)
四、注意领导人 (1927 年 3 月 9 日)	(159)
五、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 (1927 年 4 月 13 日 — 15 日)	(162)
六、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1927 年 4 月 16 日)	(176)
七、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7 年 4 月 20 日)	(178)
八、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 蒋介石背叛宣言 (1927 年 4 月 22 日)	(182)
九、为巩固北伐的基地和后方必须立即 采取的措施 (1927 年 4 月 25 日)	(185)
十、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1927 年 4 月 30 日)	(187)

十一、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1927年5月3日)	(206)
十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 (1927年5月4日)	(213)
十三、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 (1927年5月4日)	(226)
十四、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 民主专政 和无产阶级专政 (1927年5月5日)	(228)
十五、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1927年5月9日)	(237)
十六、土地问题议决案 (1927年5月9日)	(247)
十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 (1927年5月)	(256)
十八、布尔什维克的党 (1927年5月9日)	(266)
十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 (1927年5月13日)	(270)
二十、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决议 (1927年5月13日)	(274)
二十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 (1927年5月18日)	(276)
二十二、告夏斗寅部下的兵士 (1927年5月18日)	(281)
二十三、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 独立性 (1927年5月24日)	(283)
二十四、中国共产党为五卅第二周年纪念宣言 (1927年5月30日)	(294)
二十五、革命与反革命 (1927年6月1日)	(299)
二十六、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 (1927年6月4日)	(303)
二十七、中国共产党就长沙政变告全国农民群众 (1927年6月4日)	(306)
二十八、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 防御 还是进攻? (1927年6月9日)	(309)
二十九、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 (1927年6月15日)	(324)
三十、罗易给冯玉祥的公开信 (1927年6月10日)	(326)

三十一、中国（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	
（1927年6月15日）	（330）
三十二、国民革命纲领（1927年6月15日）	（332）
三十三、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公开信	
的答复（1927年6月15日）	（339）
三十四、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927年6月20日）	（341）
三十五、致上海区委的信（1927年6月23日）	（344）
三十六、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1927年6月28日）	（348）
三十七、结 论	（351）
书目索引	（357）

序 言

文件的来源及其意义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罗易无疑是所有非俄罗斯共产党人中最出类拔萃的了。罗易出身于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青年时代是一个热情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家，只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才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在共产国际领导集团中升迁得很快，成了亚洲人在亚洲传播共产主义的一个最著名的倡导者和理论家。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的一员，他的影响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是可以明显地看到的。他关于殖民地和所谓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体现在共产国际许多极其重要的决议中。

1920年8月，罗易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补充了列宁所制定的《提纲》，为共产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执行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至今仍可清楚地看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易关于在世界上不发达地区（和工业化地区不同）如何发展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方面，同列宁和毛泽东是不相上下的。

1927年，共产国际委派罗易去排解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联盟中的纠纷，当时这个联盟正面临与日俱增的分裂危机。结果是，他没有圆满地解决问题，而使自己在斯大林心目中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或者更确切些说，多半成了一个替罪羊。因此，出使中国本来可能提高他在共产国际中已经很高的声望，而事实上却使他在政治上从此一蹶不振。

罗易是在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要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到达中国

的，他亲自携带着《中国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由他帮助起草，并在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通过的。罗易根据他所理解的那样去设法贯彻这个决议案时，他发现自己同鲍罗廷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从1923年末以来，鲍罗廷一直担任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顾问。在罗易到来之前，莫斯科对于国共合作的支援，主要以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的报告为依据。但现在罗易来了，带着他自己的激进的观点和七次全会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强调了共产党全力支持业已席卷全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的重要性。

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土地革命，两者是对抗性的、互相排斥的政策，这是共产国际立场上的弱点所在。共产党人本来可以选择其中这一个方针或那一个方针，如果企图两者兼顾，最终只会陷入困境——如后来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所证实的那样。这里引用的译自俄文的文件，对于揭示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何“发生内部冲突”，以及这些互不相容的倾向如何把错综复杂局势下的各种人物推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灾难，都是大有用处的。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也好，或者是关于大会期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会议前后的有关议论和争辩也好，事实上没有什么文件可以用来说明当时的情况。伊罗生在其卓越而具有永久价值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中，相当准确地记载了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在提出自己的观点、说明当时争论的主要线索以及各种领袖人物之间冲突的性质的时候，却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基本文件。

同样，布兰特、费正清、施瓦茨合著的权威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史料汇编》中，在论述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时，他们也不得不主要借助于第二手材料。如上述著作第89页，作者写道：“下列文件是关于1927年4月底5月初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一份日文摘要，虽然很不完整，但是可以把它当作原始文件看待，这一原始文件在美国显然是得不到的。”

在米夫的著作《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对第五次代表大会也有论述和引证——列举了绝大部分的重要决议案，但并没有把那些原始讲话包括进去。

甚至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分析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间斗争情况的一些最可靠的专门著作，也不得不借助于伊罗生所引用的同样材料，以及布兰特、费正清、施瓦茨所介绍的那些日文摘要。的确，此外也无处去找根据了。

但是，我们知道在罗易的《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的序言中，他曾提到，在他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所有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议程的速记报告，以及当我逗留中国期间所有中共中央会议的速记报告，等等）都刊印在一本名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书中。这本书是国家出版局用俄文出版的”。据伊罗生说，该书并未用其他文字出版过。至于罗易自己，在莫斯科的要求下，已将原始底稿从他的柏林总部送还俄国共产党当局。直至1954年罗易去世为止，他一直认为除了莫斯科的共产党档案馆以外，别处并没有这本书的副本。此外，截至本书着手写作的时候，本书作者并未见到一本西方的专著或其他分析这一时期的作品，曾经摘录或直接引用过罗易的材料。

虽然如此，几年前派克教授告诉我们，至少有一部分莫斯科版的罗易报告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发现。后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珍本典藏处发现了第二本。鉴于此书的稀少，这些文件很珍贵，其中有许多是关于1927年中国局势方面的材料，派克教授认为（本书作者也同意）此书应译成英文，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这本书怎么会在1929年的莫斯科出版，至今是一个谜。当时罗易已不再受到斯大林的欢迎，实际上党的文件提到他的时候经常把他当作一个叛徒。但是布哈林对罗易颇具好感，可能此书是在他庇护下出版的。还有一个费解的问题，就是与罗易在《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所说的相反，这本书并未包

括中共中央所有会议的速记报告，甚至也没包括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全部议程的记录。我们所见到的只是罗易的讲话和文章，以及党的提纲、宣言、声明和布告的一个汇集。当罗易为后一本书写序言时，也许他已经忘记前一本书中的确切内容，也许莫斯科有人把那些速记报告从罗易提供的底稿上删掉了。在本书写作时，仍然得不到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不论是俄文的或中文的。

如能获得全部会议记录，当然是很理想的。但我们认为这份文件汇集尽管残缺不全，可是它不但对于中苏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而且对于叙述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和革命政府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叙述亚非拉殖民地和所谓半殖民地区域中，关于“自上革命”和“自下革命”的概念，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

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罗易生平的经历上，他早已致力于其祖国印度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革命事业。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他已参加了一个恐怖组织，立誓终生效忠于把英国人逐出印度的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私运军火进入印度，往后几年他在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东京、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旧金山等具有不同特点的地区，甚至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为革命事业效劳。罗易曾在纽约被捕。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他逃亡墨西哥。在同鲍罗廷合作下，他曾对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发挥了作用。

正是以他这种非凡的经历为背景，他关于在不发达地区进行土地革命的思想并组织共产党控制的革命政府的思想具有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在他被莫斯科的斯大林领导集团排斥以后还长期存在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件的价值就在于它为更好地了解当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各种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原始资料。

我们的意图不在于提供一本专题著作，而在于以罗易提交共产

〔一〕 据《罗易政治传记》所载：1917年6月美国参战，罗易被捕。7月，罗易乘保释机会逃到墨西哥。——译者注

国际的报告为中心，提供一本原始资料。为此目的，译文保留《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原书中的章节，另外只增加一篇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译文，这个文件在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和文件中是一再提到的。此外，我们将原书的前言放在罗易文件的末尾作为结论。

作者提出的六章评论，并不想对这些文件详加分析，而只是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历史轮廓，并对论战的意义和争论的主要线索提出看法。必须指明，收录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一书的文件部分，它所包含的有意义的历史和政治资料，远远超出评论中所提到的。

在这些文件中暴露出来的“自上革命”和“自下革命”两种策略之间的基本矛盾，自从1920年罗易和列宁展开辩论以来，一直使共产党的决策者感到头疼。最近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争论，表明这个问题仍有待于解决。在1926年，这个问题是把基本的重点放在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蒋介石进行策略性的合作上，还是把它放在发展一支进攻性独立力量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几个月后，在本书所叙述的期间内，问题在于把重点放在与武汉的“左派军人”和“小资产阶级领袖”进行合作方面，还是把它放在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方面。今天莫斯科和北京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对于纳赛尔、恩克鲁玛和苏加诺这样一些人，以当地的共产党为牺牲去依靠他们，究竟要达到多大程度和维持多长时间。

从当前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看来（正如罗易出使中国时那样），问题不在于决定是否支持民族革命运动，而是要在当地共产党和纳赛尔、恩克鲁玛和苏加诺的政府（或印度的国会民主政府）之间，有关创造一番事业所需的人力、金钱和其他物资的分配上，确定谁应有优先权。一个苏联的或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依据于他对民族运动和共产党两者的力量、潜力和人民的支持进行比较而作出评价，还依据于他对这样一个要害问题作出预测，即民族主义的领袖们是否会在共产党的政策和压力下动摇不定而“倒向帝

国主义一边”。在这一点上，值得比较一下的是，最近几年中，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待印度共产党是一种态度，另方面对待印度政府则又是一种态度。

在分析“自上革命”和“自下革命”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把分裂的界限看得过于简单了，并把盲目追随莫斯科的那些人，同胸有成竹但被斯大林固执专断所挫伤的那些人，绝对地分成两部分。例如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第77—78页上，托洛茨基把陈独秀说成是“被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领导束缚了手脚”。

在往后几年，陈独秀经常表白他自己是一贯反对同国民党合作的。根据施瓦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兴起》一书第60页中所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声称他当时不愿意同‘国民党左派’联合，正如他过去不愿同蒋介石联合一样。”同样，在《反对派通讯》1930年第15—16期第19—23页上，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宣称，在1927年5月21日长沙事变发生时，他曾两次提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决裂。

“我向鲍罗廷提议，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知道莫斯科是决不会答应的。’”

相反，罗易报告的文件中指出，在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而当时陈独秀可能同鲍罗廷的观点比较接近，并不是像他事后要使人相信的那样。

文件还进一步说明，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罗易、米夫、洛佐夫斯基、勃罗德、道利奥特)，没有一个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疑问，或“敢于提出任何不同的方针”。据伊罗生说(218页)，“罗易后来声称，他曾竭力主张中国共产党采取一项更大胆的革命方针，即使它意味着同国民党决裂也好。但当时他自己发表的报告，并不能证实他的这一主张”。伊罗生还引用了瞿秋白的话(218页)，大意是，蒋介石背叛以后，罗易并没有“指出新的叛变的可能性”。

上面提到的罗易的报告，显然是指1927年7月13日发表在《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上的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并未表明在那次失败中罗易比其他有关的人更加精明强干，或是他的判断更有先见之明。就其事实真相来看，每一个人（包括托洛茨基在内）都是事后诸葛亮而已。这些文件的确表明罗易一贯主张搞土地革命和采取一种本质上“不同方针”，一直到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当时“自上”革命和“自下”革命已经发生正面冲突。事实上罗易是继续主张支持土地革命的。他这样做可能是没有觉察到，只要在没收土地问题上对国民党左派稍作让步，就完全不可能支持农民运动〔文件十六〕；或者可能是他虽受鲍罗廷的压制，但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在这种混乱状态中，基本的事实表明，问题不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违反他们比较正确的判断）被迫服从了莫斯科简单的、教条的和极其错误的路线。毫无疑问，主要的责任在于斯大林。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置身数千里之外，又是以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以及其他共产国际代表从中国送去的、无疑是互相矛盾的情报为依据的。

根据上述考虑，基本的和严重分裂的事实，说明了问题的另一面：每个人实际上都“敢于提出不同方针”，每个人实际上“进行了争论”，而每个人又很少赞同别人的意见。那些误解、错误、矛盾的决议，是不能归因于斯大林一个人的，而是中俄两国共产党人普遍负有责任的。他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没有人清楚而又充分地预见到在协调“自上”革命和“自下”革命中的内在困难。

甚至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最苛刻的评论家当中，也有一种常见的倾向，即认为共产党领袖们具有坚如磐石的、独断专权的统帅地位，而实际上他们是很少具备的。这里附录的文件表明，1927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简单执行莫斯科制订的〔错误